

万余名居民危险区域平安大转移

郑州中原警方抢险救灾速记

又是一个不眠夜。7月22日7时许，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西流湖派出所民警贾向峰揉搓发涩的眼睛，抬头看看天空，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道：“这雨终于停了，但愿不要再下了！”一旁的西流湖派出所所长逯高亮说：“你先休息一下，现在上游郭家咀水库溃坝危险已解除，雨又时时停下，一时半会还撤不了。”贾向峰听后收起了笑容，轻声说：“家里暂时回不去，她们娘俩昨天被安全转移了。”

挨家挨户劝说群众转移

7月20日，贾向峰所在的小区在特大暴雨中被淹。他家住二楼，妻子带着7个月大的孩子在家。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家里突然停电停水，妻子焦急地拨通了他的手机说道：“你回来把我们娘俩转移出去吧，我害怕！”他回复：“你们娘俩多保重，水应该不会淹到二楼。我们派出所接到指令，正在辖区巡查，看看有没有遇险的老人、小孩。”电话那头突然没了音，他赶紧拨过去，一连拨了几十个，始终无法接通。

贾向峰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继续在辖区涉水排查。排查完毕，已是晚上8时许，他回到派出所换下警服穿上便装，驾车往家赶。因路上积水多，不少车辆抛锚，他把车往路边安全地带一停，就赤脚往家狂奔。到了小区门口，他发现根本无法进入，积水已过了腰部，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民警已拉起警戒线，劝说居民暂时不要冒险回家。他继续拨打妻子的手机，还是无法接通。

“请立即返回执行任务！”贾向峰正在想怎么和妻子联系时，接到了派出所的指令。他回到派出所后，才知道要去增援航海西路派出所。这个派出所辖区受灾严重，救援和社会治安维护任务艰巨，分局党委决定抽调其他派出所警力协助工作。

凌晨4时，如果有困难，我们再来换其他民警。”逯高亮布置完任务后，又挨个征求意见。当问到贾向峰时，他摇摇头说：“没有！按照指令，马上赶到指定地点。”

贾向峰赶到航海西路某中学附近时，发现这里的灾情比想象中的严重。这里是郑州市区金水河的源头区域，地势低，周围的雨水都往这里排。如果遇险居民得不到及时救助，会有生命危险。他蹑水走访一楼居民，劝他们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

“居民们对家的感情太深，一说转移，都不愿意。有位老人流着泪说，家底儿都在这里，我走了，将来咋办呀！”贾向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他只好对老人说，“什么能比生命珍贵呀？只要人平安，就会有好日子过”。

坚守底线确保快速撤离

21日凌晨1时许，贾向峰接到指令，增援警力就地休息，凌晨4时到航海西路与桐柏路交叉口集合。此时他才知道，分局已抽派100名警力，负责配合4个街道办事处对危险地带的居民进行转移，其中任务最重的区域就是航海西路派出所辖区。此时，民警们并不知道，他们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中。上游的郭家咀水库下游坝坡大范围冲刷垮塌，存在溃坝风险，抢险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一旦发生决口溃坝，后果不堪设想。

凌晨4时，与100名民警同时到达的还有200名武警战士，他们携带救援物资就地在某中学待命。中原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丁配杰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按照分工，100名民警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劝劝危险区域人员撤离，200名武警战士负责突发事件的救援。

作为辖区治安主管，丁配杰反复推敲预案的每一个细节，不敢有任何闪失。“我既要保证群众在指定时间内撤离，还要保证在此工作的100名民警的安全，他们背后还有一家子人啊！他们在郑州的家也在受灾呀！”话音刚落，他的眼里已噙满泪水。

“救生衣你们要一件一件地检查，确保符合安全要求。”丁配杰反复叮嘱后勤保障人员，一旦接到指令，后勤保障必须到位。

“年老体弱人员不愿撤离，思想工作难做。”有居民说，人可以撤离，家中财产咋办”……一条条信息反馈过来。丁配杰经与辖区党政领导沟通，迅速确定几条底线：三楼以下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撤离，不能自行解决安置地方的，由社区统一安置；三楼以上人员留在家中，不能私自外出；危险区域各路口拉起警戒线，所有人员和车辆只出不进，在各方的努力下，危险区域共安全撤离万余人。

想方设法做好沟通工作

民警们没想到，连日的强降雨明显减弱后，撤离的群众纷纷要求回家看看。

7月21日16时许，降雨减弱，16时30分，雨停了。执勤的桐柏路派出所副所长李兵看着越聚越多的群众，他拿起扩音器说：“不是不让你们回家，只是危险还没有解除。现在上游水库正在抢险，雨停不了是天的好事。如果抢险成功，危险解除，你们随时可以回家。”

“有些人想回家回不去，但他们听指挥，他们就在我们桐柏路派出所。”李兵还动情地讲道，21日凌晨1时许，正在值班的他接到报警求助，因列车停运，从广西到郑州参加夏令营的34名小朋友无法回家，也找不到住处，孩子们哭成一片。他带领民警赶紧将34名小朋友接到派出所休息，民警一边给孩子们烧水泡面，一边安慰他们说：“警察叔叔为你们保平安，不要害怕！”他们又联系辖区宾馆，不少宾馆因停水停电无法住人，最终有家宾馆愿意收留这些孩子，但要等现在住的客人离开。于是，民警们先腾出了宿舍，让孩子们睡觉。

李兵的这番话打动了很多人围在警戒线周围的群众，他们开始慢慢离开。与李兵一样，民警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与群众沟通。

21日17时许，贾向峰终于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原来这段时间网络中断了，她和孩子已被社区人员转移到亲戚家，手机充上电后，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报平安。放下妻子的电话，他流着泪笑了。

7月21日20时许，郑州又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直至7月22日7时，坐在路边临时办公室的丁配杰满眼通红，他一边翻阅着手机里的信息，一边对身边的同事说：“常往水库险情已经解除，郭家咀水库的抢险工作颇有成效，好消息应该很快到来！”

7月22日12时30分，丁配杰兴奋地向同事们宣布，经过连续抢险，郭家咀水库险情已经解除，100名民警正式撤离卡点。民警们顿时欢呼起来。

记者调查暑期学科类培训

暑期“拼班”补习需求大 隐患多

● 不知从何时开始，暑期成了学科类补习、培训的高峰期。望子成龙的家长纷纷将孩子送进补习班，希望孩子能先人一步，赢在起跑线上

● 记者在实地调查和调查问卷中均发现，小班课和拼班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青睐，正逐渐成为学科类培训的主流形式

● 小班课、拼班的出现，符合市场需求但不符合教育政策规定，而且拼班存在较多隐患，比如授课教师的师德问题，以及孩子管理、消防安全、人身安全等问题，同时还有收费超标和避税问题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杨惠嘉

辽宁沈阳皇姑商务大厦是一座商住两用的公寓，一家名为沈阳培英家教中心的机构位于该大厦10层，同层的还有一个剧本杀游戏室，一家企业办公室和一家家庭住址。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以学生家长的名义走进培英家教中心，踩着有些破旧的地板，侧身穿过两间教室之间狭窄的走廊，在一间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教室里，与接待人员沟通为孩子报班事宜。

“最近有关部门查得严，如果上文化课得自己找人拼班，我们找合适的老师上课。2人至4人可以，人多不敢上。”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下正值暑期。不知从何时开始，暑期成了学科类补习、培训的高峰期。望子成龙的家长纷纷将孩子送进补习班，希望孩子能先人一步，赢在起跑线上。

今年的暑期会有什么不同——教育部明确把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作为2021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在为学生和家长减负的大背景下，今年暑期前夕，安徽巢湖、云南富宁、陕西榆林等地均出台规定，明确全部关停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类的培训机构，或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在休息日及寒暑假期间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

那么，各地暑期学科类培训情况到底如何呢？记者就此展开了深入调查。

市场需求依然旺盛 辅导机构种类繁多

记者近日走访了天津蓟州、河北沧州以及辽宁沈阳皇姑、和平、铁西三区发现，当下辅导机构种类繁多，而且多聚集在学校周围。尤其是各重点中小学附近，大大小小的辅导机构扎堆，五颜六色的招牌高高挂起，蔚为壮观，“学业街”已然形成。

据观察，辅导机构大体可分为针对文化课的辅导机构和美术等艺术特长的辅导机构，营业类型可分为大型连锁教育机构、中小型私营辅导机构，以及一些个人开办的小型辅导班。

儒风教育是沈阳一所比较有名的文化课补习机构。记者走访了其位于皇姑区崇山西路一栋写字楼里的一所分校。该校主要以小班的形式组织文化课补习，初高中基本为一对一补习，一课时时长一个半小时，收费370元左右，20节课为一周期，一次性收费。

接待记者的宋老师说，暑期来报名文化课补习的家长很多，“因为我们的老师至少都有16年教学

经验，大多有几十年教学经验，教学质量高，口碑好，很多都是家长、学生之间相互介绍过来的”。

在河北沧州，记者走访了多个暑期课外辅导班，从试听听课的情况看，参加辅导的学生为数不少。

东风社区有一个私人辅导班，记者走进去发现，辅导班就在普通居民楼里，客厅，房间就是课堂，里面摆满了老旧的桌椅板凳。辅导班负责人介绍说，暑期辅导班有5位老师，教授小学到高中的课程。5位老师均为当地高中精英班应届毕业生，刚参加完高考，成绩不错，费用为3000元20课时。

记者以学生家长的身份试听了一节课，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塞下了15个学生和一位老师，年轻的老师可能还没有适应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变，一味讲解答案，课堂气氛略显尴尬。

为什么在为为学生和家长减负的大背景下，学科类培训热依然不减呢？家长们都是如何选择的呢？

记者就此做了一份问卷调查，向北京、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市的100多名小学至高中的家长发出了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0多份。

调查数据显示，78%的家长会给子女报暑期培训班，其中报学科类培训班的占61%，其余为美术、乐器等艺术类培训。选择暑期学科类培训的家长们的理由无外乎两个，要么是觉得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需要补一补；要么就是孩子本来成绩不错，准备再提高一下。

据调查，参加过培训班的人中，上课地点在写字楼或培训机构的占68%，剩余32%则在居民楼，老师家里或自己家里补习。在老师的选择上，67%的家长注重选择经验丰富的学校老师或培训机构老师，部分家长可以接受在校大学生。同时，大多数家长没太注意授课老师是否有职业资格证书，“教得好就行”是大家的共识。费用方面，由于地域不同，一课时花费基本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整治之下形式变化 小班拼班受到青睐

记者在实地调查和调查问卷中均发现，小班课和拼班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青睐，正逐渐成为学科类培训的主流形式。

走进天津蓟州、河北沧州、辽宁沈阳的多个小区，记者注意到，小区里张贴的培训类广告大多与美术、音乐等有关，很少看到培训文化课的广告。但居民们告诉记者，实际上，居民楼里隐藏着不少学科类补习班，基本是小班课和拼班形式，有的小广告贴到了楼道里，更多的是通过家长之间口口相传。

在蓟州同乐园小区，一位李姓业主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就在小区里上小班课，老师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上课，一节课100元左右。“我觉得挺好的，一个班就四五个孩子，老师补课也有针对性，而且在家门口，接送也方便。”

在沧州东风社区，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孩子和两个同班同学拼了个班，一起邀请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金牌教师”授课，授课地点就在老师家中，每人每节课250元。

记者提出能否去现场试听课？该家长立马摆手说：“学校老师暑期给学生补课是违反规定的，被举报将受处罚。我们再三保证就身边几个人请她补课，绝对不会让外人参与进来。”

调查问卷中，就补习文化课，72%的家长表示会选择10人以下的小班课或拼班，15%的家长表示选择一对一私教，只有13%的家长选择10人以上的大班课。

蓟州一位在家中带小班课的老师告诉记者，她是一名退休教师，原来寒暑假给亲戚家孩子作辅导，孩子学习成绩有较大提高，后来亲戚向一些家长推荐了她，她就一起带了几个孩子，“我收费不高，就是为了让生活更充实些”。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拼班现象的兴起，是在教育部门不断加大对培训机构整治力度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整治过程中，一些培训机构业务量大减，有的甚至无法开课，或开课成本大幅提高，导致学科类培训形式发生变化，“拼班热”就出现了。这也说明，社会上对学科类培训的需求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山东青岛一名姓柳的学生家长非常认同上述说法。他认为拼班、小班课是发展趋势，“现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家长自然希望孩子能在成绩上拔得头筹，将来找个好工作。而且，你不参加暑期培训，别人家的孩子也不会不参加吗？既然一些培训机构不开课，比较隐蔽的拼班、小班课正好填补了这一空隙”。

也有不少受访者指出：“拼班其实挺影响人的，人员进进出出不说，有的孩子年龄小，比较调皮，在房间甚至楼道里追逐打闹，吵得很。”其中，来自沈阳皇姑区的王女士说，她住的是老小区的3楼，4楼就有个老师拼班教学，“日子就没清静过”。

监管难度大 风险高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目前，学校教育满足不了社会的现实需求，校

外培训又有所限制，拼班现象自然就出现了。”中国

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直言，拼班让家长的支出更多，相关部门监管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程平源看来，小班课、拼班可以算是“地下运作”，其出现符合市场需求但不符合教育政策规定，而且拼班存在较多隐患，比如授课教师的师德问题，以及孩子管理、消防安全、人身安全等问题，同时还有收费超标和避税问题。

在为学生和家长减负的大背景下，如何才能解决好拼班问题，乃至暑期学科类培训问题呢？

程方平认为，拼班现象应该由政策来解决，政策需要多部门参与研讨制定，要有可实施性。同时，一些曾经形成的成熟经验具有借鉴意义，比如由地方政府部门举办丰富多彩的夏令营，运用少年宫开展系列活动，学校适当地举办兴趣班，企事业单位组织职工子女出游等，解决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合力。

储朝晖认为，如果治标不治本，解决好了拼班问题，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所以，他认为要系统地考虑培训机构的治理，改进教育评价机制，提高学校的效能，实现学校之间的均衡，只有这些都做到位了，没有了拼班的需求，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对于如何减少需求？他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教育评价改革，尽可能改变标准过于单一的评价；效能提升，提高公立学校的效能；努力实现学校之间的均衡，让学校之间没有明显差距。

对于少数在职教师开展校外培训的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应当严惩不贷。《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教师应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教育部《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也指出，违反规定的在职中小学教师，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相应的行政处分。

“为什么有很多学校老师，甚至是特别优秀的老师来到培训机构或者自己办班上课？是不是因为教师的待遇偏低，一些学校团队建设不力，还是有的人师德风出了问题？希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多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着想，不要让老师为教课之外的事发愁，也不要让家长为课外培训发愁。”一位上海的家长这样说道。

制图/李晓军

“浙江解纷码”汇聚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多方力量

打开手机就能“码”上解纷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俞 冲

从“只进一扇门”到“只扫一个码”。在浙江，数字法治这一新举措令人称道。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浙江省长兴县看到，当地市民遇到了矛盾纠纷，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浙江解纷码”，就能实现“码”上解纷。

长兴县人民法院院长潘轶华介绍，一个“码”，牵起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的八方力量，随时为“想找个说法”的群众提供解纷渠道，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7月8日，浙江正式对外发布“浙江解纷码”（线上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数字法治场景应用。“浙江解纷码”在全省正式上线运行。这也意味着，由长兴县法院首创的“一案一编码”“一码管到底”的解纷码走向全省，成为浙江数字化改革的最新成果之一。

智能分层过滤

体验解纷码，只需点开“浙里办”App进入“浙江解纷码”应用，在线反映纠纷事项后，就可以自主选择线上调解，平台将智能分发至相应的调解机构。同时，也可选择线下调解，平台会指定矛调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2020年5月1日，“长兴解纷码”经过前期研发，首次上线试运行，在5个乡镇开展试点。7月3日，“长兴解纷码”在全县正式铺开。2021年3月，解纷码面向湖州全市推广。而今，“浙江解纷码”正式上线运行。

王女士是长兴县一家游乐园的营业员，去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她和同事的工资没了着落，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里，通过解纷码扫码上传了相关

情况。很快，劳动仲裁部门联合街道司法所与游乐园老板协商，帮她和同事顺利拿到了工资。“以前都说‘有事找政府’，但我们哪里分得清什么事找什么部门，现在‘只扫一个码’就行，这让老百姓很暖心。”

据介绍，解纷码实行“一案一编码，一码管到底、全程可追溯”。当事人在平台完成录入后，平台即生成一个二维码，当事人只需保存该二维码，便可通过扫码，全流程实时追溯纠纷调解环节、进度、结果，确保心中有数。同时，平台还为当事人提供在线司法确认和诉讼立案功能，在纠纷调解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全周期的司法保障。

对老百姓而言，遇到事情，最烦要跑要问；有了难题，最怕被“踢皮球”“打太极”。“针对这类问题，解纷码通过智能分案规则、三层过滤体系，明确村、镇、县三级调解组织，专业调解组织等责任主体的工作职责和办理流程，自动分发给调解员个人或明确的调解组织，并对纠纷响应时间、调解时长作出硬性规定及预警提醒。”长兴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高福良表示，小小的解纷码，牵起了矛盾化解的各方力量，打造一个纠纷协同治理体系。

重心下移力量下沉

“解纷码在长兴首创，不是偶然的灵感乍现，而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下的必然产物。”潘轶华介绍，早在2018年，长兴就创新打造调解—诉讼—执行一体化工作机制，整合社会治理多方资源，发挥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和人民法院各自职能优势，探索实施以诉前多元调解为基础，以调解、诉讼、执行层层衔接、逐层递进为主要内容的诉非衔接新路径，并明确将调解成功率、法院委派案件响应率等指标纳入平安建设考核。

然而，在诉源治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长兴县法院也发现了问题：这种纠纷“一步到院”，再由法院作为中樞分流出去的模式，难以完全压实各调处组织的主体责任，调解过程中有时会存在“等一等”“推一推”的情况。

解纷码作为矛盾纠纷办一体化平台，村、镇、县三级调解组织及交通、公安等专业组织，各类社会调解机构等纷纷进驻，通过智能分案、逐层过滤、明确考核，实现矛盾纠纷层层递进流转，推动纠纷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切实压实各级调解组织责任，有效破解了以往责任主体不明、调解资源缺乏整合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过去几年浙江鲜明的时代标志。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曾就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浙江努力把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成为“重要窗口”的标志性工程，让群众有了纠纷“最多跑一地”，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化解。长兴依托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深化“最多跑一地”改革，依托解纷码打造首个线上矛调中心，实现解纷“最多扫一码”。

“我们是最早一批试点解纷码的乡镇，两年时间下来，全县群众直接到法院诉讼立案的案件同比下降了50%以上，纠纷成讼率大大降低，真正让大量纠纷化解在诉前。”洪桥镇党委副书记沈树明说。

自2020年5月1试运行以来，解纷码平台共受理纠纷6195件，成功化解4388件，化解成功率70.8%，解纷平均用时仅6天。

直面痛点难点问题

“长兴解纷码”为何可以成为“浙江解纷码”？

究其原因，就是这项法治数字化改革直面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痛点和难点，以群众的感受确立改革标准，以群众的获得感评价改革成效。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矛盾纠纷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基层治理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品质，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潘轶华表示，“在平台打造之初，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要让老百姓只申请，后续事项都依托平台智能化推进，直至有效解决。同时，我们始终秉持‘两不两用’的原则，‘两不’是指不搞重复建设、不增加基层负担，‘两用’是指好用管用。”

在解纷码平台升级优化过程中，专班人员始终坚持以用户感受为标准，以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推动创新。同时，依托解纷码实现矛盾纠纷排查见底，解决了以往纠纷案件信息不透明、部门不共享的问题。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打造集智能分案、多元解纷、大数据监管，运用数字化解纷码形成全景覆盖、全过程把控和全链式管理的矛盾纠纷化解模式，整合线上线下各类调解资源，为基层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提供数字化提升思路。

现在，“浙江解纷码”融合了司法行政、信访、劳动、人社保等多部门资源，汇聚5000余家专业调解机构，4万余名调解员，在全省范围内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系统。

“‘浙江解纷码’是落实数字中国建设决策部署，推进浙江省数字法治系统建设的重要场景，是回应群众多元解纷需求的有力举措。”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朱晨向《法治日报》记者表示，浙江将把“浙江解纷码”打造成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主渠道、主阵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